镇江商埠的历史沿革

戴迎华

镇江，古称京口，又名润州。其地素以商业闻名，商业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镇江商业发展的原因

首先，镇江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其商业的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封建时期，商业发展的关键是商品流通和运输，因而离不开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自古以来，商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沿大江大河，如苏州、杭州、嘉兴、湖州、松江、扬州、重庆等。镇江，自古“大江横陈，群峰怀抱。”《宋书·文帝记》记载说：“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送四达城邑。”《齐书·州郡志》更突出了镇江形势的险要，认为京口“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部，内镇尤重。”隋代大运河贯通以后，镇江立即处于运河、长江的十字交汇点，其航道西接金陵，东通海上，北达淮泗，南达杭州，水陆交通的便利使镇江地区具备了便于物资交流、人员往来的商业条件。明代以后，江南是商品生产的中心，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起点，跨过长江承接了北方的里运河，密切联系着江南地区与广大的北方和内地，便利了南北各地的商品交流。

其次，镇江境内水陆两路交通发达，为地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往来的便利条件。元代以来，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启，长江

中下游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根据王辑五在《中国日本交通史》中的研究，明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形成了两条固定的中国航线，一条是：兵库—博多—值嘉岛—宁波—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北京。另一条为：土界—坊津—宁波—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北京。镇江地处这两条海外交通线的交叉点，商品经济得到加速发展。此外，连接镇江城乡的“大路”、“小路”也有数条。这些陆路与密布交错的水路相结合，构成了镇江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条件。

第三，自明清以来，镇江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之间，其东南方是商品经济繁荣的苏杭经济带，西边是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突出的中国南方的封建大都市——南京，商业发展有其特殊的优势。镇江距离南京极近，是设防南京的重要关卡，其与南京的关系，正如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所述：“京口南控江湖，北拒淮泗，山川形胜，自昔用武处也。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江为襟要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南京）门户锁钥，不可不重也……”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镇江与南京之间政治军事的密切关联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永乐迁都前，南京是全国的中心市场。迁都后，南京成为江南的区域中心市场。然而，不管是前者抑或后者，作为南京市场的延伸，镇江沟通了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联系。镇江与苏州、杭州的经济联系也十分密切。永乐迁都后，明政府对大运河的重视远甚从前，江南地区的流通商品大多经长江、运河沿南

京、镇江一线进出集散，进入以苏杭为中心的太湖、松江、嘉湖地区为纵深的市场腹地。镇江地处两大中心市场之间，商业受到两大市场的辐射和影响，发展成为江南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镇江商埠的历史沿革

（一）明清以前的镇江商业

西晋以来，京口地方就已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会。西晋时的京口是商贾云集之地，居民多以商贩为业。东晋时期，镇江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六朝时，京口出现了中转、集散和销售米、谷及布、帛、绢、丝等手工业产品甚至海货的大规模的市场。唐时，镇江“舸帆林立、商业繁盛”，有“银码头”之称。宋代，“镇江除了豪强货殖、官商专利外，民间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这里不仅是国家商品运输通道和集散之地，而且也是南商北贾多民族人员和海外番客的交易之所，是继京城和扬州、杭州少数几个城市后，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城市之一。”元朝镇江商业发展的状况，从《马可·波罗行记》的相关记述可见一斑：“镇江府城是一蛮子城市，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所以见有富商大贾。”

（二）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明清之际，镇江商业秉承了一贯的繁荣，车船往来频繁，商品集散繁盛，八方商贾汇集，人称“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

镇江首先是一个漕粮集散中心，沙船必经之地。镇江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的漕运。永乐北迁后，明政府的财赋来源愈加依赖南方，尤其是苏、松、杭、常、镇诸府，南北运河成为明代漕

运的主要渠道，南方各省漕船大多自江南运河过镇江北上。清代实行海禁，运河更为繁忙，镇江成为湖广、浙江、江西尤其是苏、松、常、嘉湖地区漕粮入江的中转要地。京口驻防副都统海龄因而奏称“京口乃七省咽喉”。

米粮业在镇江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柳诒徵先生说：“镇江故有米市，广潮商人及钓卫、沙网各帮，均萃于镇，轮帆迭运，为商业之大宗。”鸦片战争前镇江的米粮业已有一定的规模。镇江土地贫瘠，多丘陵，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并非粮食产区，缺米现象不可避免，米市随之出现。正如明人刘世教在其《教荒者略》中所说：“往者京口、泸墅之间，百谷之舫无日也不灌输而南者，盖在岁丰而已借资与外境矣。何者？其生齿繁而土之毛不能给耳？”《乾隆镇江府志》、《光绪丹徒县志》皆有关于米市的记载，也表明了米市贸易的存在。

除米粮业以外，镇江的棉布、丝绸运量和交易量也比较大。在丝绸贸易方面，除了中转的作用以外，镇江本地的丝绸业比较发达。江绸业是镇江享有盛名的一个传统行业。元代，镇江手工业就以丝织业为主。发展至清代，镇江出现了“拥有一千台织机、三四千人的大型手工工场”。清代，“京江绸”是镇江地方手工业的一大特色，制作工艺精良，质地上乘，声名远播，行销各地，其“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黔滇，南越吴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泝淮泗，道汝洛……”

木材业是明清镇江商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镇江自古是长江中上游所产木材的集散地之一。江南地处平原，木材向来缺乏，大

都依赖外地输入，木材市场极为兴盛。唐代，镇江江面便布满了水排木筏。明代中叶，镇江因木业之盛而被誉为江南木业“早期鼻祖”。清时，镇江“木业更是兴旺，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云集镇江的客帮有七八十家之多”。在江南木材市场中，镇江木业地位突出。清代木商说：“皇木、架木、椿木等项，向来凡奉文采办，首责省滩承值，而镇江次之，其余苏、常各属，不过零星小贩，且四季粮船拥塞，木少运艰……京口地处滨江，簰夫停泊亦多。”鲇鱼套是镇江著名的木材集散中心，至鸦片战争前，镇江木帮有江西帮、湖南帮（南帮）、湖北帮（北帮）、安徽帮等。

（三）开埠通商后的镇江商业发展

1861 年 5 月，镇江开埠通商。随之，海关设立，洋商进入，镇江出现了华洋杂处、商贾云集、商业畸形繁荣的历史局面。

转口贸易功能突出。19 世纪末，镇江成为中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首先是国内物资的大量转运，江南的绸布，长江中上游的木材、桐油，苏北的土特产、大米，河南东部、山东南部之外运货物，循长江、运河来此集散。其次是镇江口岸进出口贸易日益扩大。进口方面，外商洋货大量涌入，主要有洋药（鸦片）、棉布、棉纱、玻璃、食糖、煤油等。据统计，19 世纪 60 年代，镇江洋货额净值在 300 万关两到 500 万关两之间，70 年代则上升到 600 万关两到 900 万关两。传统商业演进发展。开埠后，镇江传统商业演进变化，向新近代商业递嬗的倾向明显。开埠后，镇江木材业更是兴旺，规模日趋扩大，木材销售数量和营业额也远甚开埠前。镇江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江海轮船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吸引了青岛、烟台、宁波、潮州各地客帮来镇设庄设号、收购米粮，镇江的米粮业逐步兴盛，

1866年,镇江形成了长江下游唯一大米市,并成立了米业公所。其“盛时,米粮最高年销量,出口约200余万包(每包含市秤200斤),各种豆类、杂粮内外销高达300万包之巨”。鸦片战争后,绸布业受洋货的冲击和利润的驱使,一些大的绸缎商店和布店除保留传统的经营以外,开始兼营洋货。据记载,镇江“绸布、洋货、匹头虽原分三业,以后互相兼营,不易截然分开”。

新式商业开始出现。洋货业占据了镇江近代商业的主要部分。1887年,镇江的英国领事报告说:“镇江位于流贯南北的河道交叉处,其位置对于发展子口贸易很合理想——洋人在城里受到憎恶,可是对于洋货,则没有同样的反感……有许多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全省的洋货完全由镇江供应……没有镇江这一条约的口岸,洋货无法大量深入。”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涌入,镇江出现了销售洋货的专门商店,洋药、洋油、洋烟、洋布很快转输各地。由于子口半税制度的确立,一些当地商人凭一纸子口税单,直接向外商进货,镇江口岸很快成为进口洋货的一大市场。洋糖是外国输入的大宗商品之一,开埠后镇江最初进口的洋糖有印尼的青糖(江糖、赤糖、砂糖)、白糖和冰糖以及吕宋青糖,稍后有古巴赤糖,英国的太古怡和东糖等。镇江航运业也畸形发展。首先是外商轮船公司纷纷涌来,先后插足镇江航运业的外国洋行有18家之多。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5艘上等轮船经营镇江—九江—汉口航线,客货业务非常旺盛。此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成轮船公司、日商日清轮船公司接踵而至,占据了镇江大部分的轮运市场。外商轮船公司的出现,虽然带有明显的经济侵略目的,但客观上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镇江民

族航运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873 年，轮船招商局镇江分局成立，成为镇江最早的本国轮船运输企业，但其实力和规模及经营范围均不及外商洋行。

三、近代镇江商业发展的阻滞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镇江口岸地位下降，盛极一时的镇江商业日趋衰落，从一个远距离、巨大的集散中心降为一个近距离贸易为主的集散地，镇江市面日趋凋敝。

如前所述，镇江商业的繁荣，首先得益于自身良好的地理条件，地理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近代镇江商业发展的停滞、衰落。20 世纪初叶，京汉、胶济铁路相继通车，国内市场中的商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经镇江中转的货物立即改变了集散方向，北方的土特产等货物，改道汉口和青岛转输，镇江货运大减，商业腹地大大收缩，仅限于苏北地区和淮北之一部。1908 年，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建立，南京等口岸立即分其势而起，有实力的外商、洋行和国内客帮纷纷迁往上海等其它城市，本帮较有实力的一些商号如元生丰、新义和、协和也都迁往上海，本地仅留象征性字号作为门面。除了铁路运输的影响，镇江江面沙滩日渐淤塞，轮船停靠不便，不仅轮运业受到打击，更使镇江市的转输机能受到极大限制。镇江商业本以转口贸易为核心，转运功能的丧失带给近代镇江商业致命的打击，受其影响，镇江商贸日趋衰落。

一方面，镇江商业发展缺乏连续性、稳定性。明清以来，镇江经济的繁荣主要建立在转口贸易基础之上，开埠通商后，传统商业的演进和新式商业企业的发展更多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与地方民族工业关

联不大。另一方面，镇江近代工业基础也比较薄弱。相较于东南沿海、长江沿岸的其它城市，近代镇江工业起步较晚（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力量薄弱，更缺乏地方性的支柱产业，仅有的工业大多集中在轻工业方面，如面粉厂、电灯公司、榨油厂、火柴厂等，建材、机械工业、化工业等重工业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些企业因为资金少、规模小，自生自灭是常有的事。由于地方工业的不甚发达，近代镇江商业缺乏应有的基础，失去了良性发展的可能。

除了客观条件的影响之外，主观条件是影响商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商业经营理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了商业的发展。近代镇江商人大多因循守旧，愚昧落后，不善随机应变，终致近代商业失去了一贯的繁荣。商业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方式是现代商业发展的核心因素，良好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方式是近代商业良性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在近代镇江，无论是传统商业还是新式商业，商业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方式变化不大，传统的独资经营和合伙经营的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几乎没有，同业之间竞争多于联合，相互独立，各自为政，一些大的字号行栈依然是家庭式的经营，并未真正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商业企业。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近代镇江商业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鼎盛过后，走向了衰落，商业发展的阻滞、凋敝对近代镇江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代镇江，因商兴而兴，必也因商衰而衰，镇江本是一个以商贸为主的城市，商业是其经济的支柱。随着商业的衰败，镇江经济江河日下。民初，镇江商业中的五大业——江广业、江绸业、木材业、绸布业、钱庄业相继减色，一些大的商号、字号虽能维系一些当散未散的客户，却早已了无生气，渐归湮没，洋行、国内

各帮纷纷撤走，镇江经济局势面目全非，数十年的经济繁荣美梦终于结束。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戴迎华，1969 年 2 月生，江苏泰兴人，历史学博士，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研究。主持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状态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镇江开埠及其近代社会变迁》等部、省级及市厅级课题 6 项，参与 10 余项国家级、省级、市级课题。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参编 2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